

我
欲
凌
风
归
寥
廓

吴江别集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我
欲
凌
风
归
寥
廓

吴江别集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收入这个集子的，大部分是近年所写的文字。笔者已是 90 岁以上的人了，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有限，即使对于某些现实问题有所议论，也只不过是提出个人的一些关注点而已，并没有什么值得人注意的新看法，有的难免流于陈言。集子中有几篇文章讨论改革开放时期的“反右”即“反自由化”问题，并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和如何对待“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问题，有关同志各抒己见，是非由读者评论。这些问题已进入历史，但对现实仍有影响。此外，有几篇纪念性的文字，除纪念人物外，特地刊出我的旧作《政治沧桑 60 年》一书的结束语，因为那里记载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关注农民问题的解决。这也算是老人的一种回忆。为此，同时收录一篇《四川行》，或可供关心农民问题的同志参考，附带说一句：这篇文章写于 1994 年，较早提出了关于开发中国中西部的问题。

吴江

2011 年 10 月

目 录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001
----------------	-----

风雨兼程 30 年

——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而作	001
世人争谈“中国模式”	008
中国走民主化之路为何如此艰难?	013
从袁世凯称帝失败谈起	018
郑重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021
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	024
“普世价值”索解	029
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032
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036
慎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042
国故·国学·中国传统文化	045
我们应当记住	050

附:

重读赵丹遗言

——赵丹逝世 20 周年祭（向继东）	056
--------------------------	-----

试解“中国之谜”	
——法国思想界探讨中国问题述评	063
改革开放中遭遇的一场“运动”和有关争论	074
欲说无语忆周扬	086
专题讨论：关于胡乔木的两条史料及因此引发的讨论	089
留下两条重要的史料（吴江）	089
因此引发的讨论之一：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	
做一点补正（宋木文）	090
对于我所提供的两条史料的补充说明（吴江）	093
胡乔木致胡耀邦的一封信（附：吴江评说）	096
因此引发的讨论之二：胡乔木在大转折年代对	
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贡献	
——学习笔记：从吴江同志的“两条	
重要的史料”说起（宋木文）	100
又读宋木文的补正文（吴江）	109
我的歉意和简单说明（吴江）	114
因此引发的讨论之三：关于胡乔木致吴江信的真相	
——回答吴江的质疑（黎虹）	116
关于路线问题再说几句（吴江）	123
关于使用“路线斗争”一词的争论的由来	126
谈“实践的思想路线”	
——兼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133
居家养老：化解老龄社会之困	147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能否相提并论？	154
《政治沧桑60年》结束语	
——成也农民问题，败也农民问题	159
四川行	172

忆刘澜涛·····	181
林海行·····	191
关于历史剧的创作方法·····	195
冷石斋诗抄·····	207

风雨兼程 30 年

——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而作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也是风风雨雨 30 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阵风，动摇了为害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根基；几场雨，冲刷了闭关锁国几世纪所积累的愚昧落后，力挽狂澜，使我国不仅摆脱了“文革”所造成的险境并奇迹般地闯进了世界大国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因此，也最终使人们相信在世界历史上终将铭刻上属于中国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相伴而来的一场争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开局。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为总

结过去、开拓未来制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称之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而历史则将记载下这是20世纪末期中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外国一家颇有眼力的报纸评论说：“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果非常大的原则，它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开始一段还纠缠于以调整为主还是以改革为主的争论，待到广大农民自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的樊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改革立刻成为无可阻挡的主流。改革又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和计划这两股势力的较量极其复杂激烈，经过好多个回合。不少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占强势，也有人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直到党的“十二大”以后才将我们的经济定位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这也不过是探索中获得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在达到这个经济中间站的时候，曾一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但由于改革仓促进行，未达到预定目标，加上当时其他

因素，反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导致上层领导人的变动。不久又招致了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式的学潮，引起政局动荡。两次事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最受影响的自然是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事业。刚失势的计划经济势力企图乘机卷土重来，有人更大张“共产主义建设”的旗帜以图阻挡改革，最终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形势趋于严峻。恰当时，变革中的苏联突然垮台，东欧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怎么办？会引起骨牌效应吗？中外都在等着瞧。刚经历过两次事件的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一时对改革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卸掉了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以元老身份离开北京到广东深圳特区一带巡视（他显然是以保护者的角色最后一次莅临这个象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区），他一路上讲了一些极重要、针对性极强的话。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一百年也不能动摇；继续走我们自己改革的路，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经济特区就要以市场经济为主；不要害怕向资本主义学习，要更加敞开大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及管理经验，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对外则要“韬光养晦”，严格保持独立自主。

邓小平这次南方讲话震动了北京，在那里，各种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国家就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引起了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大为吃惊，它们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采取静观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

自此之后，主要就是依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并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并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国终于重新崛起于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的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使过去那些“保四争五派”（即认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4%，争取5%）哑口无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大为增强。不要忘记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大体可以举出如下诸项作为标志：嫦娥一号发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支线飞机下线，动车组飞驶大江南北，冀东南堡10亿吨大油田被探明，国家巨资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机歼-10亮相，等等。

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世人的注意。举一个例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我看，这也可看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绘。

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

到了这一步，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处于内外交誉的“盛世”。这可称之为“盲目乐观派”。其实，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就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转型”也还没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们这个有 13 亿人口并且地区差别极大的大国，整个市场操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经受实践检验，资本市场和汇率更是两个薄弱的环节。目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的说，只是为建设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开拓了空间，为进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种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来了，如何发展民主成为人们集中谈论的话题：例如，如何铺开乡镇直选并进行县级选举的试点，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如何精简国家机构，实现大部门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级选举制以代替长期存在的层层委派制。

这里特别要提到如何改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有关政体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首先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据如上所说，我们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且管辖不同地区的大国，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有误，甚至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民主和集中，应当说，民主是主体，集中则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驾于民主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和发号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应当服务于民主即服务于人民，就是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过去我们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实际上是以集中压民主。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之手，领导权力既无监督亦无制衡。这

种权力垄断势必使特权横行，特权成为贪污腐败之源。这是我们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要作专题研究，这里不多说。

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

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乐观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我们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就是已经过初步改革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审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显出措施失当，以致弊端丛生。如教育部门（主要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却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级，实际上是降格，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则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反被轻视。这便远离了办教育的宗旨。以此而欲求文化学术之繁荣，其可得乎？

我国的改革当然有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随之大为增强，我们已是堂堂世界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还相当大，广大乡村发展之路还很艰难。因此总体上，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说，中国是“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大国”。毫无疑义，我们正在富有和强盛起来，但贫穷和脆弱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我

看来，我们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我们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进入“深水处”，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包括上面所说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这些问题都要用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因此，改革不能停顿或半途而废。就外部环境说，世界的格局和形势正在激烈变动中，多极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种势力正在较量中，许多问题难以预测。而在我们身边，“台独”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30年来，在和平共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趋成熟，自尊、理性、务实、友好、开放，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和从容应对这个领域的骤风疾雨，不负大国的声誉，世界影响力日增。我们不搞霸权只求和平，但外交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日益增多，敌意和隐患并未在我们面前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问题，坚定地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总之，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势大变，不仅社会主义以崭新发展模式稳稳地站住了脚，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盛世”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8年2月25日）

世人争谈“中国模式”

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被称为金融海啸，人人谈“海啸”色变，唯独有一特殊现象，就是连西方许多人都重看中国的发展，都在争说“中国模式”，认为“一场金融海啸反使‘中国模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并拿“中国模式”来和其他发展模式（包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比。当然，所谓中国模式，其内容不过就是说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式、发展道路，不是制造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型”，它本身也处在发展变化中。对于“中国模式”，不少有见识的西方人大都欣赏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就是先使政治稳定下来，然后大胆发展经济，创新经济体制，甚至采用某些资本主义方法推进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大力使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经过了一场激烈持久的斗争，保守势力曾在这一领域反复进行争夺。一位西方评论家就此回顾苏联的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协作之下，甚至删去宪法第二条，即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这就为索罗斯等世界金融巨头制造了很大的温床”。

但中国的经济先行并不是政治丝毫不动，不给经济提供助力，事实并非如此。诚如一位中国青年评论家俞可平所说，中国是采取“增量民主”的办法，所谓“增量民主”，就是说在

中国，民主的进步是采取渐进形式而不是突变形式，急不得，也慢不得，急生变，慢亦生变。这从基层普选和上层采取的某些使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措施可以看出来。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情况各异的大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中国的市场有一个有效的保护层，这就是国家（国务院）有一个宏观调控市场的机制（当然要以有效率的政府为前提），使之少受市场自发起伏的影响。（按：这里我认为必须指出：市场经济本无所谓姓“社”姓“资”之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遵照价值规律进行宏观调控，为培育社会主义因素而进行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之下的市场经济，包括采取福利政策的国家在内。）

在评论中国发展模式时，最使国外学者们感兴趣并引起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没有西方式民主，能否使经济得到发展？一场金融海啸和使世界瞩目的中国发展模式使人们重新反思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体会深切。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欧政客和舆论，一直企图以印度的“民主道路”把中国道路比下去，但并不如愿。2007年11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一次演讲中强调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几天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一次集会上，向印度政要热情推荐这个演讲，还特别指出“希望印度能维持良好的民主机制，但民主也有缺陷”。早在2006年9月，一位俄罗斯经济学教授波波夫就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

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以上均摘自香港《镜报》月刊）最近《镜报》月刊又有一篇文章指出，西方一些政治人物总喜欢将“民主是普世价值”一语挂在嘴边，事实是否如此呢？当然，民主是一种非常正面的东西，没有人会否定它，但是民主有各种各样，说“西方式民主是普世价值”显然是言过其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说，西方的民主价值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它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义，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就以美国来说，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自身的选举制度和民主形式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民主诉求，选民不能直接投票给自己属意的总统候选人，人民投完票后便一无所有，选举总是以金钱为主导并且充满伪善和贪婪。所以现在一场金融海啸促使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中国，他们注意到：“中国模式”既融入国际社会，又不依附西方；既借鉴吸取资本主义因素，又坚持独立自主道路；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民主的渐进，经济的高速，社会的稳定，日益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见之于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中表现出来。

就拿渐进民主一项来说。2008年2月7日德国《新德意报》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2008年2月，美国“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

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以上是所见所闻的一方面。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处在“摸着石头过河”即不断尝试、发展之中。关于这方面，总括起来说，第一，中国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前提下对适合于自己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特点的民主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远景规划，相反，在这方面倒不时听到一些不协调的杂音；第二，在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改革不到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导致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面临严峻的考验，看来中国不能独善其身；第三，当今中国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外来敌对势力能够将其打败，“台独”、“藏独”、“东突”、邪教组织，都不足惧，唯一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只有来自内部的腐败。尽管近年来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权力私相授受、卖官买官等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蔓延之势。许多腐败源于用人不当，监督不力，领导人拥有特权。不能治人，焉能治国？

“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绝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最近美国有一家报社以“重估中国的崛起”为题，指出“中国的崛起并非‘铁板钉钉’”，说“在中国未来地位上有着太多的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变数，同时也有太多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变数”。这是向我们敲起了警钟。须